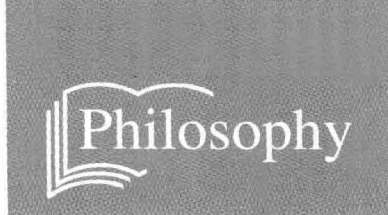


范式的追寻

——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SEEKING FOR PARADIGM: AN INQUIR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S A PARADIGM

汪信砚◎著



范式的追寻

——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SEEKING FOR PARADIGM: AN INQUIR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S A PARADIGM

汪信砚◎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汪信砚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01-013785-8

I. ①范… II. ①汪…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5083 号

范式的追寻

FASHI DE ZHUIXUN

——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汪信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3.75

字数:5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3785-8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陶德麟

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是李达先生在 1956 年重建武大哲学系时创立的。李达先生一贯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他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如《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唯物辩证法大纲》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典,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武汉大学创建的这个学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鹄的是很自然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经历曲折、道路坎坷,但他的几代后继人一直遵循着他的教诲,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扬着他的精神。改革开放后,这个学科焕发了新的生机,在被评为我国首批国家重点学科以后的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的平台,进一步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认同;尤为可喜的是涌现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作为的中青年学者,芳林新叶,后继有人。本书作者汪信砚教授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汪信砚教授是我招收和指导的第二届博士生之一,1988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 年 28 岁时晋升为副教授,1993 年 32 岁时晋升为教授,1995 年 34 岁时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此后又先后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涌现出来的优秀中青年学者之一。他理论功底坚实,专业兴趣广泛,视野开阔,致思缜密,在认识论、价值论、自然观、历史观、社会哲学、人学、环境伦理学等多个领域都提出了许多富有个性特色并经常被人们引证的学术见解,很有建树。近十多年来,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面用力尤为刻苦,发表了多种论著。现在,他把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部分论文汇集成书,形成了这部《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本书中的许多论文,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辨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致思方向》、《新世纪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等，都曾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些被列为年度中国哲学界发表的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也为相关研究者们所熟悉。在这里，我只想从整体上谈谈这部著作的三个重要特色。

第一，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追寻这一主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并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实然与应然的关系的考辨，自觉地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是本书最重要的特色，也是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面最突出的贡献。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研究领域应有的根本范式，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属于一种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那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属于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作者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虽然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应该是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但从总体上看，以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实际上都曾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界日益边缘化，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或现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在作者看来，要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所面临的种种迷局或危机，要整合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各种不同的思路，首先必须回归或重新确立实际上是由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作者还把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加以推广和延伸，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应该是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同范式，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应该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都应该以各自的方式服务于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此相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研究的根本范式。由此，作者在本书中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炼为一种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开拓和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全新视界，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和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了一种方法论上的“顶层设计”。

第二，本书不仅从总体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炼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而且也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建构。作者在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做了多维度、多层面的考察和探析。作者在书中把他对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相对地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探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三个部分,但从内容上看,实际上每一个部分的探讨都有其方法论上的精心设计。例如,无论是在本书中的哪一个部分中,作者都特别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一百五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和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的广阔背景下来考察,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流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性发展的关系,也探讨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百余年来西学东渐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世界眼光和宽广视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建构上,作者尤其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和多维比较研究。作者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深化到微观个案研究的层次,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各个阶段上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考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特贡献,弄清他们个性化的哲学创造的实现过程及其留下的经验教训;与此同时,还必须深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外两方面的比较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其他外域文化中国化(如佛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这类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普遍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规律。不仅如此,作者还实际进行了这类微观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本书中的第三部分内容,特别是关于李达、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理论贡献的探讨以及相关的比较研究,就是作者运用其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可以说,正是由于作者特别注重方法论的建构,所以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第三,本书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系列关键理论问题做了非常深刻的探析。这些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内存的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复杂内涵、理论根据、思想前提、本质要求和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等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亦即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种误解和曲解,如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不科学或不准确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毫无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百年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不过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层面上应定位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关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等;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而出现的问题,亦即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而必须走出的诸种理论误区,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教科书批判情结和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特别是文本崇拜、对洋教条的迷信等各式新老教条主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析,作者清晰地阐明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以及应该如何坚持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也许作者的一些观点并不都能为他人所接受,但只要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无法绕开、就不能不面对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我与作者有师生之谊,又有长期合作的经历,以上所见难免拘于一隅。我期待着学术界方家同仁不吝批评指正,我想作者也必定有同样的期待。

2014年3月25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序	陶德麟 1
---------	-------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反思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3
在微观层次上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5
民族意识·世界意识·人类意识	
——世纪之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方法论问题	9
视野·论域·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三个方法论问题	19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	29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致思方向	35
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4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式	52
作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56
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	64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探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	8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	91
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105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据、实质和发展方向	11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辨误	119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34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54
反对教条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7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	179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19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三题·····	20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途径·····	211
生态平衡与和谐社会的哲学价值论审视·····	219
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的理论建设·····	228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236
中国共产党 90 年思想理论建设的历史经验 ·····	242
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石·····	249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

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	257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	270
李达哲学探索的独特理论个性·····	282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深刻启示·····	296
李达开创的学术传统及其意义·····	307
李达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319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	338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理论贡献·····	351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读《陶德麟文集》 ·····	365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方法论反思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概言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谓的“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但从总体上看,其内容不外乎两大基本方面,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当前现实。其中,中国的当前现实又包括两个不同的侧面,即立足于中国来看的或曰中国置身于其中并必然要面对的当前世界以及立足于世界来看的当前中国,并且这二者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是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炼出具有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指导当前中国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如此繁难和艰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在其推进过程中必然要一再面临诸多有待澄清和明确的前提性的方法论问题。例如,源于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能够中国化?它怎么可能被用来改铸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创立于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能够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确有其事?它是否如某些人所说是近百年“西学东渐”的一个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何在?为什么说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当前和今后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此等等。概括起来,这些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为何必要以及应该以怎样的理论视野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坚持哪些正确的方法论原则的问题。应该

说,这些前提性的方法论问题都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倘若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根本不可能之事,那么,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也就纯属子虚乌有,从而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当前和今后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我们就必须首先从理论上研究和澄清这些前提性的方法论问题。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承载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前提性的方法论问题往往也关涉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事实上,当前和今后应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直接地就是应如何开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作不懈的理论斗争,特别是必须坚决反对各种表面上极其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完全相悖谬的教条主义。强调这一点,对于当前和今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繁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极其重要。这是因为,在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老式的教条主义被从大门驱逐出去以后,现已改头换面,在“回到文本”的堂而皇之的名义下并以“文本崇拜”的形式从后门重又登堂入室;与此同时,一种新式的教条主义即对洋教条的迷信也相当盛行,一些人极其迷恋的“以西解马”、“以西评马”和“以西誉马”便是其突出表现。诚然,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以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为基础,也必须认真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见解,包括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和挑战。但是,如果像“文本崇拜”那样痴迷于文本而无视中国的当前现实,或者像洋教条迷信那样唯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是从而不对之作具体分析,一句话,如果只“唯书”、“唯西”而就是不“唯实”,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就会毁于一旦,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只会收获一窝“跳蚤”。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当前和今后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就必须坚决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本文是作者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栏所写的“主持人语”,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2期,此处略有删节)

在微观层次上深入开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着理论与实践两个既内在相关、又相互区别的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层面,其核心内容是人们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以及为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相关哲学探索,当然也包括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课题本身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探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以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范导,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始终贯穿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自觉反思和不懈探索。但是,以往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宏观层次上,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这种研究层次,严重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深度;仅仅停留在这种研究层次,很难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当前和今后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深入到微观层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微观层次的研究,当首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多维度研究。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在中西文化大激荡的条件下进行和不断向前推进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仿佛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结合起来的过程,而是一个包含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探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与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交汇、互动和激烈论争的复杂的、丰富的总体。要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首先就必须理论地再现这一丰富的总体。为此,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在多维度上展开。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交汇和互动而言,我们既要认真甄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和对立,也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些社会文化思潮在交汇、互动和激烈论争过程中的互相影响、借鉴和吸收;

既要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超越和战胜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方面的成功经验,也要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思想交锋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重要教训。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探索来说,我们既要具体考察不同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思想中吸取了哪些思想养分、从时代和中国现实实践中提升出了哪些哲学问题,也要深入反思不同时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运用了哪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充分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大标志性成果的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也要高度重视和探讨不同时期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在多维度地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即要努力探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是在怎样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明确提出并由毛泽东首次作了科学说明的。针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国内外学术界曾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讲过的;但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民族化,这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人提出过,即使是俄国人也未曾提出过。因此,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为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创新。其实,针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所基于的共同前提,即认为以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人提出过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有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不仅有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理论渊源,而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经历了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系统地清理、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源流、发展轨迹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和理论得失,是我们在微观层次上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微观层次的研究,也应当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个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艰辛探索的结果,它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血和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无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贡献。不了解他们每个人高度个性化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的历程,从而也不可能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换句话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就必须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各个阶段上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考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特贡献,弄清他们个性化的哲学创造的实现过程及其留下的经验教训。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停留在宏观层次的情况下,人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个案研究。例如,在毛泽东哲学的研究上,正如对待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人们一般都强调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至于毛泽东哲学中哪些内容是毛泽东本人的哲学创造、哪些内容是其他人的理论贡献,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其实,不对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一系列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作深入的个案研究,我们既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也无法真正说明何以只有毛泽东才能集中全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而创立毛泽东哲学,从而也就不可能通过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微观层次的研究,还应当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外两方面的比较研究。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现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我们发现思想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要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必须高度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显然,这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的比较研究,是以前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个案研究为前提和基础的。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的比较研究,我们就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坚持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如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虽然它们所依托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理论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一些问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面,因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必然在若干重要方面有一些共同或相似之

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如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越南化等的比较研究,必将在确立起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世界视野、世界眼光的同时,从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引向深入。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本文是作者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栏所写的“主持人语”,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3期,此处略有删节)